



# 贫困与反贫困的学术视野与研究进路

## ——《鉴往知来——十八世纪以来国际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述评》

姚力

贫困与反贫困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同行,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也因此成为了历久弥新的学术命题。18世纪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催生下,现代社会科学不断提出富有解释力的新理论与新思想,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也呈现出“百家争鸣”局面。如何学习、借鉴和吸收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是社会科学创新 and 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当务之急。就此而言,《鉴往知来——十八世纪以来国际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述评》的出版正逢其时。其敢于挑战理论命题的学术勇气和从问题出发的现实关怀,无不彰显了此项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一、学术寻踪:深度理解和把握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贫困问题由来已久,为什么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在18世纪才真正出现?该书首先回答了这一疑问。尽管贫困并非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工业化的产物,但“直到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sup>[1]15</sup>。一方面是财富的涌流,一方面是贫者愈贫。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开启了对这一话题的学术探讨。承此,在认知贫困、解释贫困、治理贫困的发展路径上,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衍生生成枝蔓丛生的理论体系。

作者以时间为序,兼顾理论的学科视野和内在关联,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国际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学术发展史,阐述了300多年来西方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产生的背景、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及其影响。全书十章中仅有一章介绍中国理论,概述中国先秦至今2000多年的反贫困观点,有近一半的篇幅介绍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成果。这种“厚今薄古”的布局和对“他者眼光”的偏重,符合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自身发展的实际,突出了本书立足当下、反观自省的研究指向。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其信息之完整、脉络之清晰、视野之开阔、跨度之时长,都是值得称道的。

“从研究内容上看,贫困与反贫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sup>[1]15</sup>,然而,从学术发展历程来看,先有对贫困概念、贫困原因、贫困类型的研究,直到1968年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的《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一书出版时,才由他首次提出“反贫困”这一研究术语,并运用“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阐释发展中国家贫困发生与发展的机制,提出反贫困的对策与建议。贫困与反贫困以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学术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广义的反贫困理论包括了对贫困内涵、致贫原因以及消除贫困途径等方面的探讨”<sup>[1]15</sup>。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各国政府反贫困实践的推进,以及国际机构、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其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主题不断丰富拓展,从经济学到社会学再到两者并重,从单一学科迈向多学科综合研究;从个体到结构,从微观到宏观再到微观具体;从国家内部到区域再到国家之间;从相对贫困、广义贫困到多维贫困;从贫困的代际传递、贫困文化、社会情境和社会结构到社会排斥、可持续生计;从参与式扶贫、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减贫到主观贫困、信息贫困、空间贫困;从益贫式增长、包容式增长到绿色增长,等等。在理论的传承与继替中,在阐释问题的衔接与比照中,我们看到了理论之间的渊源与进路,看到了科际整合的学术视野。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为何

具有如此魅力,为何能成为吸引多个学科持续关注、创新不断的研究领域?

究其根本,是贫困与反贫困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既是一个长期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简单明了又切近,但又是一个极其复杂、久治不愈的世界性难题。它不仅受制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与政治、文化、人口、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同时,与人权、性别、生态、发展等诸多现实热点问题相互勾连,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最大挑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继出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减贫任务的广泛性与艰巨性。严峻的现实问题需要理论的指导,反过来又为理论提供了检验、完善和深化的空间。本书引述了国内外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完整展示了在现实需求与应用之间,理论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较好发挥了述评体裁——把握动态、发现问题、启示未来的特色与长处。

## 二、焦点议题:贫困主体识别与反贫困策略

在内容庞杂、主题多变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中,贯穿着一条逻辑发展主线,即“存在贫困—贫困内涵—贫困的原因—贫困的测量、分类和特征—减缓和消除贫困—反贫困效果评估—贫困与发展问题的进一步反思”<sup>[1]283-284</sup>,其中最核心的研究议题是“贫困主体识别”和“反贫困策略”。前者是研究的入口,后者是研究的出口,抓住了这两头也便打通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筋脉。

“贫困主体识别”涉及贫困内涵、贫困测量等问题,是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起点,也是重点。19世纪末本杰明·西伯姆·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第一次提出贫困线和初级贫困、次级贫困概念,为“贫困”下了一个科学的、可以实际考量的定义,奠定了以收入为基础的传统贫困测量方法。20世纪初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人类基本需求”概念,在满足人类发展基本需求的贫困线中引入非物质要素。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维克特·法克斯(Fuchs Victor)等人提出“相对贫困”概念,随后,被英国学者鲁西曼(Runciman)和汤森德(Townsend)等人继承发展,认为贫困是与某一参照物比较之下的贫困,更关注个人或家庭生活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的差异程度。1990年,世界银行根据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计算,提出1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以及一天2美元的贫困标准,成为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及反贫困项目广泛认可和执行的贫困测量方法<sup>[1]173</sup>。此后,这些概念和测量标准被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物质经济因素之外增添了社会平等、资本、权利等综合分析的视角。被誉为“穷人的经济学家”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进一步拓展了贫困概念,提出了基于能力、权利和福利的能力贫困观,把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看成是识别贫困的通行标志。他凭借在福利经济学上的数项关键性贡献,199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权利贫困概念是在家庭脆弱性融入社会排斥概念后产生的,涵盖了个体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缺失而引发的贫困,采用参与式的调查方法进行测量。在多维贫困理论的支撑下,多维贫困测量维度、指标不断更新,出现了人类贫困指数(HPI)、人类发展指数(HDI)、多维贫困指数(MPI),以及中国学者研究提出的参与式贫困指数(PPI)等测量方法。这种从单一指标向多维指标、从客观认定到主观认定的转变,为贫困主体识别的实际操作提供了科学的参考。近年来,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首先解决的就是精准识别问题,为此国家制定了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在建档立卡、驻村帮扶、第三方评估等具体、精细的管理措施保证下,贫困识别与反贫困策略从粗放“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反贫困策略”涉及反贫困主体和反贫困政策等问题,是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落脚点,也是难点。最初贫困被看成是个人的私事,家庭、家族肩负着反贫困的连带责任,宗教组织和民间团体以慈善救济方式为穷人提供关怀和慰藉。马克思最早从制度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进行反思

和批判,并站在劳动者立场上,揭示贫困的根源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实质。当国家制度、经济分配、社会结构等因素走入贫困成因的分析框架后,国家、政府、社会陆续走上了反贫困主体的位置,应对贫困的策略从单纯依赖经济增长的经济救济,向完善社会制度、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权利的维护等多向度发力,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协同推进,共同担负起反贫困主体的责任。

在减贫实践中,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助推着反贫困策略的调整与更新。以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为例,在他提出“贫穷国家经济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以及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轻视”<sup>[1]127</sup>等一系列“贫穷经济”的论断后,得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并被应用于改进减贫与贫困援助计划、资金、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加大了对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在内的人力资本的重视与投入,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我国在反贫困上的成就,虽与舒尔茨的理论无关,但巧合的是,新中国前30年的反贫困作法却为其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例证。改革开放后我国扶贫成就突飞猛进,一方面得益于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新中国建立后积累了雄厚的人力资本。仅以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49年时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只有35岁,处于当时世界最低水平。新中国建立后,以人民群众政治地位的提升和经济生活的改善为基础,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等手段,人民群众健康状况和身体素质显著提高。人口预期寿命,1957年提高到57岁,1981年提高到67.88岁,提高将近1倍。也就是说,1949年后的30多年间大体平均每年延长1岁的寿命<sup>[2]126</sup>。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足以得出结论,新中国前30年在人力资本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的减贫事业铸就了坚实的根基。

纵观全书,我们发现无论是18世纪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提出抑制人口增长、19世纪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第一个发问“谁是穷人”,还是20世纪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 Rodan)的“大推进理论”、21世纪的反贫困治理,都聚焦于“贫困主体识别”和“反贫困策略”的探讨,一浪高过一浪的理论争鸣将它们推上了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 三、脱贫攻坚: 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实践

贫困与反贫困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本书最后对“西方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本土化探索”“新中国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梳理和概括,将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综述落脚于启迪和指导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体现了“鉴往知来”的最终归宿。

回首新中国反贫困斗争史,尽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启动,但自从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带领人民群众拉开了与贫困抗争的帷幕。近70年来,面对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和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富有不同时代特点的扶贫思想和工作策略,其中贯穿始终的是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与信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通过工业化和合作化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以社会救济等措施为主要载体,“创造了一个极为平等的社会,有效地消除了极端人类贫困现象”<sup>[3]166</sup>。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党中央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将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发展经济带动扶贫开发事业的进步。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江泽民将扶贫开发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系统提出了国家扶贫开发理论。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中国扶贫开发思想理论。正是在这些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一个又一个政策相继出台,一辈又一辈人接续苦干,中国才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发展成第二大经济体。1982年“三西”专项扶贫计划首开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年

国务院扶贫小组成立,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1994年第一个全国性的扶贫计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颁布实施。2001年和2011年,国务院先后颁布实施两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扶贫工作大步推进,取得了7亿多贫困人口陆续脱贫的辉煌战果。2012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9899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0.2%<sup>[4]2</sup>,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历史新阶段。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仍存在较大的贫困群体,而且分布广、程度深,扶贫工作遭遇“最难啃的骨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sup>[5]16</sup>。他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立场上,“把扶贫开发作为关乎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大事,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形成了新的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并为此做出了总体部署”<sup>[6]13</sup>。他多次到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调研,了解扶贫开发工作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新理念,形成了内源扶贫、科学扶贫、精神脱贫、教育脱贫、生态扶贫、发展扶贫等思想。这些思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扶贫开发思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年来,党中央以时不我待、攻坚克难的决心,把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各级政府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表倒逼的力度,将扶贫工作放在第一位,及时跟进扶贫政策,完善工作机制,坚决落实精准扶贫战略。“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sup>[4]5</sup>。在扶贫攻坚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中国扶贫经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国扶贫开发的成就与经验,不仅惠及了中国百姓,而且将为世界人民所共享。

今天,在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之时,民族复兴的使命与大国责任的担当,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的智慧启迪。本书“鉴往知来”立意高远,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定将在中国学者和扶贫工作者的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呈现。

#### [参考文献]

- [1] 黄承伟,刘欣,周晶. 鉴往知来——十八世纪以来国际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述评.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 [2] 许涤新,主编. 当代中国的人口.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
- [3] 胡鞍钢. 从世界最大贫困人口国到小康社会(1949—2020)——在首届“10·17”论坛上的主题演讲//10·17论坛组委会秘书处,编. 扶贫开发与全面小康——首届10·17论坛文集.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 [4]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编. 新发展理念案例选·脱贫攻坚.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 [5] 习近平.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6] 刘永富. 打好扶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首届“10·17”论坛上的主旨演讲//10·17论坛组委会秘书处,编. 扶贫开发与全面小康——首届10·17论坛文集.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9)